

历史学家的 修养和技艺

LISHI XUEJIA DE XIUYANG HE JIYI

李剑鸣◎著

上海三联书店

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

LISHI XUEJIA DE XIUYANG HE JIYI

LISHI XUEJIA DE XIUYANG HE JIYI

上海三联书店

李剑鸣 ©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/李剑鸣著. —上海:上海三联书店, 2007. 1

ISBN 978 - 7 - 5426 - 2446 - 8

I. 历... II. 李... III. 史学家—修养 IV. K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43735 号

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

著 者 / 李剑鸣

责任编辑 / 王秦伟

装帧设计 / 鲁继德

监 制 / 林信忠

责任校对 / 张大伟

出版发行 / 上海三联书店

(200031)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

<http://www.sanlian.com>

E-mail: shsanlian@yahoo.com.cn

印 刷 /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07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640×960 1/16

字 数 / 430 千字

印 张 / 29.75

ISBN 978 - 7 - 5426 - 2446 - 8/C · 179

定价: 45.00 元

目 录

导 言/1

第一章 历史学的特征/11

- 一 专业化之路/11
- 二 文史的合与分/22
- 三 科学主义的得失/29
- 四 社会科学的影响/39
- 五 独特的人文学/47

第二章 历史知识的性质/54

- 一 个别与一般/54
- 二 治史的选择性/60
- 三 知识的相对性/68
- 四 客观性问题/75
- 五 史学的真实/83

第三章 研究中的立场/90

- 一 治史的任务/90
- 二 人文关怀/97
- 三 现在与过去/103
- 四 偏私与公正/115
- 五 民族与国际/122

第四章 研究者的学养/129

- 一 知识积累/129
- 二 理论修养/136
- 三 专业训练/145
- 四 文化底蕴/153
- 五 历史的想像力/158

第五章 治学的路径/163

- 一 求知与求用/163
- 二 博通与专精/173
- 三 史德与自律/181
- 四 学问的境界/187
- 五 读书与治学/194

第六章 继承与创新/205

- 一 学术史的梳理/206
- 二 二手文献的利用/211
- 三 问题与方法/218
- 四 材料与解释/226
- 五 由“述”而“作”/230

第七章 史料与史学/236

- 一 史料的概念/237
- 二 史料的类型/241
- 三 史料的地位/248
- 四 史料的解读/259
- 五 史料的运用/269

第八章 解释的建构/277

- 一 解释的含义/277
- 二 解释的地位/281
- 三 解释的模式/285
- 四 理解与评价/294
- 五 事实关联/305

第九章 叙事与分析/312

- 一 历史叙事/312
- 二 因果分析/319
- 三 比较方法/329
- 四 定量分析/334
- 五 心理分析与假设/339

第十章 选题与研究/345

- 一 课题的类型/345
- 二 问题与选题/350
- 三 课题的确定/355
- 四 资料的收集/362
- 五 资料的梳理/368

第十一章 体例与规范/372

- 一 体裁的演变/372
- 二 文体的特征/377
- 三 引文的处理/381
- 四 标注的方式/389
- 五 图表、译名与书目/398

第十二章 写作与表述/407

- 一 写作的意义/407
- 二 论著的构成/411
- 三 成文的步骤/418
- 四 表述的方式/423
- 五 文章的修养/428

索引/441

参考书目/453

后记/470

导 言

目前外间似乎流行一种见解,觉得历史虽然没有什么用,但学起来并不困难。有的学生报考历史系的研究生,可能并非出于对史学的喜好,而是因为相对容易考取。在一般人的观念中,研究历史并不需要特殊的禀赋和才能,只要记忆力好,能坐“冷板凳”,就可以取得出色的成就。但国内外史学界的实际,似乎与这种看法形成了鲜明的反差。古往今来,令人折服的史学大师寥若晨星,学识精湛而优美可诵的史学著作也是凤毛麟角。这表明,一个人仅凭好的记忆力和坐得住“冷板凳”,显然不足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。

17 世纪的法国人皮埃尔·培尔(Pierre Bayle, 1674—1706),在他的《历史词典》中就历史写作发表了一番评论:

一般说来,写历史是一个作家所能涉猎的最具难度的创作,或者说是最难的一种。它要求有超常的判断,有高贵、清晰而简洁的风格,有出色的道德感,要完全笃诚正直,要有许多极好的资料,并有将它们安排得井然有序的技巧;最重要的是,要有抵御宗教狂热本能的力量,而这种本能会怂恿我们排斥(cry down)我们认为真实的东西。¹

在这里,他不仅强调了历史写作的难度和特殊性,而且对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提出了很高的标准。根据他的看法,历史写作比文学创

1 转引自海登·怀特:《元史学:19 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》(Hayden White, *Metahistory: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the Nineteenth-Century Europe*),巴尔的摩 1973 年版,第 49 页。

作要困难得多,做一个历史学家决不是一件简单轻松的事。

其实,比培尔早生近一千年的唐代学者刘知几,对这个问题就有很深刻的认识。刘知几主持国史编修长达 20 余年,还写了一部中国最早的系统的史学理论著作《史通》,可以说得到了史学的“三昧”。当有人问他为什么自古以来“文士多而史才少”时,他回答说:史家必须具备“才、学、识”三方面的素质;有“学”无“才”,就好比家有资产而不善经营,不能生财;有“才”无“学”,又恰如能工巧匠没有材料和工具,也造不出房屋;而且,史家还要有正义感,要敢于肩负道德责任;能集这些条件于一身的人自然不多,“故史才少也”。¹ 这就是常说的“史家三长”之论。

后来的学者对“史家三长”的含义有不同的理解,说法也不完全一样。清代学者章学诚说:“义理存乎识,词章存乎才,征实存乎学,刘子玄所以有三长难兼之论也。”² 按照他的说法,“识”是阐释历史的意义、提出独立见解的能力,“才”集中表现为写作水平,而“学”则是史家个人所掌握的知识和资料的总量。关于“识”和“学”,他的见解可以说得到了公认,发生分歧的主要是对“才”的理解。梁启超大体上接受了章学诚的意见,称“史才”为“作史的技术”,也就是“文章的构造”,具体包括材料及文章的“组织”和“文采”两个方面。³ 钱穆对“史才”的看法不是这样,他强调研究问题的能力,认为“贵能分析,又贵能综合”,是“才”的突出表现。⁴ 他们两人的说法各有侧重,如果合起来就比较全面了:“史才”就是研究和写作的能力。清末的朱一新谈到,“考证须学,议论须识,合之乃善”;⁵ 魏源批评《元史》的纂修者,说他们“有史才而无史学、史识,八月成书,是以疏舛四出”。⁶ 可见,他们都同意刘知几的“史家三长”说,认为才、学、识三者彼此联系,相得益彰,只有集于一身的人,才能称得上“良史之材”。

1 刘向等:《旧唐书》,中华书局 1975 年版,第 10 册,第 3173 页。

2 章学诚:《章学诚遗书》,文物出版社 1985 年影印,第 33 页。

3 梁启超: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,东方出版社 1996 年版,第 177—182 页。

4 钱穆: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,三联书店 2001 年版,第 12 页。

5 转引自余英时:《历史与思想》,台北: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76 年版,第 2 页。

6 魏源:“拟进呈元史新编表”,魏源:《元史新编》(慎微堂刊本),台北:文海出版社影印(年代不详),第 1 册,第 1 页。

然而,历来讨论治史的人,大多认为“三长”难以兼备。章学诚说:“才、学、识三者,得一不易,而兼三尤难。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,职是故也。”¹ 不过,才、学、识应当有层次之分,把标准定得过高,符合的人自然就寥寥无几。如果只求在三方面达到一定的境界,就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。章学诚还说过:

由风尚之所成言之,则曰考订、词章、义理;由吾人之所具言之,则才、学、识也;由童蒙之初启言之,则记性、作性、悟性也。考订主于学,辞章主于才,义理主于识,人当自辨其所长矣。记性积而成学,作性扩而成才,悟性达而为识,虽童蒙可与入德,又知斯道之不远人矣。²

照这样说来,一个人只要注意开发自己的长处,刻苦学习,不断提高修养,就完全可以形成研究历史的基本素质。

良好的天赋当然是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,如果在记忆、理解、想像、文辞各个方面都能超出常人,成才的道路肯定要顺畅得多。但经验表明,单靠天赋还不足以成为“良史”。训练、实践和勤奋同样很重要。前辈学者总是提醒后学,要趁年轻加强“基本功”训练,“打好基础”。中国古代史专家赵光贤认为,研究历史,“首先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,也就是要打好基础”。他所说的这种“准备工作”或“基础”,包括理论修养、古汉语能力、目录学和校勘学知识。³ 古典文学专家程千帆对治学的“基本功”做了更有理论色彩的界定:一是本学科的基础知识;二是本学科的基本材料;三是本学科的基本研究手段;四是本学科的基本操作规程。⁴ 如果将他们两人的说法结合起来,就能比较完整地界定史学“基本功”的内涵:丰富而可靠的专业知识,深厚而坚实的理论修养,广博而详赡的史料占有,精纯而实用的方法技艺,严谨而得当的学术规范。初学者沿这个方向用功,就可以不断接近“良史”这一目标。

1 章学诚:《章学诚遗书》,第40页。

2 章学诚:《章学诚遗书》,第85页。

3 赵光贤:“中国历史研究法讲话”,《历史教学》,1982年第2期,第32—37页。

4 程千帆:《治学小言》,齐鲁书社1986年版,第50页。

年轻时代是“打基础”的最佳阶段，这虽是常识，而做到却并不容易。这个时期人的精力旺盛，吸收力强，如果全力以赴，就可以为今后的学术工作练就扎实的“基本功”。但年轻人也容易耽于幻想，难以抵御各种诱惑，以至把持不定，虚掷时光。所谓“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”，似乎不仅仅是提醒年轻人趁早用功的一个警句，而更像是许多“过来人”的心酸体会。另外，研究历史的人还需要长期积累和终身磨砺，即使是有成就的学者，也需要不断学习，以改善素质，增进学力。如果一头扎进自己的专业领地，成年累月只知道做课题、找材料和写文章，而忽略了修养的提高，就难以成为学问大家。古语说“文章老更成”，史家的学问更需要很长时期的积累，同时还要通过时间来检验。

归根到底，才、学、识三者的结合，就构成了史家的综合素养。史家研究一个历史问题，实际上是面对一个遥远而陌生的世界，只能依靠一些蛛丝马迹来描摹过去的图景，如果没有渊博的知识、丰富的想像和高明的技艺，如果没有博大的人文关怀和打通古今的魄力，就会感到束手无策。另一方面，史家毕竟又是生活在现实中的普通人，他在研究中不可能完全排除自己的情感和成见，也无法抹去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在他的精神上打下的印记，为了获得可靠而可信的历史知识，他需要面对许多难题，需要处理各种复杂的关系。如果没有很高的综合素养，他很可能会举步维艰。除此之外，综合素养的高低，还会直接影响到方法的选择和运用，并且最后反映在论著的学术水准上。关于综合素养的重要性，美国历史学家史华慈在1964年说过一段值得玩味的话：

最根本的一点是(话虽陈旧,但说的是实情),一个人无论是什么学科背景,他的整体文化素养(或者说他的“整个教育”)越广博,越深厚,他就越愿意调动他所拥有的一切才智来作用于他正在探讨的课题。这种才智不论是否来自其学科的“方法论”,都能够增加他说出有意义的东西的可能性。相反,如果用独立自足的(self-contained)“模式”或“体系”来狭隘地看待某个孤立的“学科”,并将它机械地运用于一种文化(无论是当代的还是“传统的”),而一个文化修养有限的人对这种文化的任何其他方

面又没有做过什么研究,就会导致没有创造性的、甚至是荒谬的结果。¹

史华慈这段话的中心意思在于强调,历史学者如果只顾引进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,而忽视整体的文化修养,理论和方法就难以发挥作用。他显然不是说,方法对于治史是无足轻重的。史学早已成了一个专业,但凡专业都有自己的专门方法。² 不过,不同时代的史学,在方法上有不同的特色;历史学家对史学方法及其意义的态度,也不完全一致。

长期在美国求学和执教的余英时,结合中国近代史家的看法来谈史学方法,认为主要有两个不同层次的含义:一是把它“看作一般的科学方法在史学研究方面的引申”,如“大胆假设,小心求证”之类;二是“指各种专门学科中的分析技术,如天文、地质、考古、生物等各种科学中的具体方法都可以帮助历史问题的解决”。³ 他没有提到史学所特有的方法。事实上,史学方法是由一般思维方法和特殊专业方法构成的,两者相辅为用,缺一不可。当然,有的一般思维方法由于与史学特性相结合而发生了转化,变成了专业方法。另外,史学在方法上历来具有很大的开放性,史家向来重视吸收其他学科的方法,以补充和完善研究的工具和手段。不过,如果说史学有自己的方法论体系,那么在这个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应是专业方法,因为没有专业方法,其他方法就会失去依托,也难以发挥效力。

另有一些学者否认史学有独特的方法。法国学者保罗·韦纳在《怎样写历史:方法论》一书中谈到,史学“只是一种真实的叙述”;它没有方法,“是因为没有特殊要求:凡叙事真实就能满足要求”。他甚至断言,“自从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以来,历史研究方法并没有取得

1 史华慈:“‘多学科’的拜物教”(Benjamin Schwartz, "The Fetish of the 'Disciplines'"),《亚洲研究学报》(*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*),第23卷,第4期(1964年8月),第537页。这段话的译文可参见陈启云:“关于思想文化史研究”,《开放时代》,2003年第6期,第42页。

2 “方法”和“方法论”是两个既有联系、又有区别的概念。“方法”指的是研究中使用的技艺,而“方法论”则是关于方法的认识,是对方法的理论阐述。

3 余英时:《论士衡史》,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,第443—445页。

什么进步”。¹ 这种说法如果不是夸张,就很可能是妄断。从常识上说,史学如果没有自己的方法,怎么能够称作一门单独的学问呢?史学经历了数千年的演化,在研究方法上又怎么可能毫无发展呢?美国学者海登·怀特写道:“历史学家在传统上认为,历史研究既不需要一种特定的方法论,也不需要特殊的知识装备。通常所说的历史学家的‘训练’就大部分来说包括学习几种语言,熟练的档案工作,和一些固定的练习,以便熟悉该领域的标准参考书和杂志。此外,关于人类事务的一般经验,边缘领域的阅历,自制能力和健康的身体,就是所需要的一切了。任何人都能很容易地满足这些要求。”² 他没有说明这种看法的具体出处,不知道持这种“传统”看法的“历史学家”究竟是哪些人。如果真像他说的那样,史学史上的大师就不会如此之少了。不过,职业史家的确不喜欢抽象地谈论方法,他们不过是从研究的实践中学会和掌握了方法,这就不免给外人造成一种错觉:史学没有自己的方法。

还有一种“史无定法”的说法。³ 中国经济史专家吴承明对此有精辟的阐释:“我主张‘史无定法’。研究经济史,唯(原文如此——引者)一根据是经过考证的你认为可信的史料,怎样解释和处理它,可根据所研究问题的性质和史料的可能性,选择你认为适宜的方法,进行研究。不同问题可用不同方法;同一问题也可用多种方法来论证,结论相同,益增信心,结论相悖,可暂置疑。”⁴ 他还谈到,“史无定法,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的方法都可有选择地用于历史研究,特别是用于实证”。⁵ 从他的话可以引申出四个重要的观点:第一,史学方法是多元的,不存在“惟一科学”或“惟一正确”的方法;第二,离开研究的实

1 转引自保罗·利科:《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》(王建华译),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,第69—70、76页。

2 海登·怀特:“历史的负担”,载海登·怀特:《后现代历史叙事学》(陈永国、张万娟译)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,第50页。

3 余英时:《论史衡史》,第444页。

4 吴承明:“经济史:历史观与方法论”,《中国经济史研究》,2001年第3期,第13页。他在此前的“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”(《中国经济史研究》,1992年第1期,第3页)一文中提出了类似看法。

5 吴承明:“经济史研究的实证主义和有关问题”,《南开经济研究》,2000年第6期,第19页。(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)

践来谈论方法并没有什么意义,方法的选择和运用必须考虑具体问题和材料的要求;第三,史学方法是开放的,可以根据研究的需要而吸收其他学科的方法;第四,史家在研究中采用什么方法,不一定有明确的自觉意识,正如画家创作一样,运用什么技法,通常受到表现需要和创作情绪的支配。总之,方法本身没有高下好坏之分,差别主要在于它是否同问题和材料相匹配,以及运用是否得当。

有经验的学者还经常提醒初学者:不能迷信方法。¹他们可能会说,司马迁并不是先研究了史学方法,才开始写作《史记》的。还有人说,一个优秀史家的诞生,靠的不是方法,而是才能;不是材料,而是对材料的使用。这些说法固然可从历代大学者的成功经验中得到印证,但不能作为轻视方法训练的根据。实际上,司马迁的先辈担任朝廷史官,他本人长期随父司马谈读书习史,其中自然包括方法的训练。即使是大师巨匠,也要经过自我的或制度性的专业训练,在掌握了一定的方法、技巧和规范以后,方能步入自由创造的境界。例如,西班牙画家毕加索突破了传统绘画的程式,自创生面,名标画史,但他早年已经十分纯熟地掌握了传统绘画的技法。历史研究中的方法创新,也不能离开对已有方法的继承。初学者尤其要掌握史学方法的一般知识,培养方法论的自觉意识,这是步入治史门径、把握研究方向的重要条件。

但是,要掌握历史研究的方法,不能单纯依赖史学方法教程。史学方法的最大特点是它的典范性、经验性和实践性。方法不是可以拿来就用的工具,它只有被人理解和掌握以后才能发挥作用,因此,说到底它是一种个体性的素质。方法主要不是栖身在方法论教程里面,而是潜藏于学者的治史实践和典范论著当中。观察成名学者的治史经验,阅读高水平的史学论著,乃是参悟治史方法的最佳方式。

1 美国历史学家戴维·费希尔反对“对方法论的迷信”,他认为,任何方法都不能离开具体事物而单独存在,方法只能通过运用来证明其存在,世界上并没有什么“The Method”(意即惟一的、标准的方法);他还引用马克斯·韦伯的话说,方法论作为富有成果的智力工作的先决条件,其程度不会超过解剖学知识作为“正确”行走的先决条件。见戴维·费希尔:《历史学家的谬误:寻求历史思想的逻辑》(David H. Fischer, *Historians' Fallacies: Toward a Logic of Historical Thought*),纽约1970年版,第xx-xxi页。另参见余英时:《论士衡史》,第443-445页。

而且,学者通常是在不断的实践中逐渐了解和掌握方法的,初学者需要自己读书,找材料,写文章,以便逐渐懂得如何运用专业技艺。只读方法论指南,自己不动手做研究,是不可能真正领会史学方法的。

而且,治史是一种复杂而微妙的智力操作,用什么方法,以及如何运用方法,可能都带有“只可意会、不可言传”的特点。研究者探讨一个问题,在选择和运用方法时,可能有自觉的意识,也可能仅凭某种潜在的感觉。在研究一个问题时使用某种方法,可能收效很好;但在另一个课题的研究中使用同样的方法,结果也许不甚理想。再者,不同的研究者处理同一个问题,可能会选用不同的方法。更重要的是,方法的运用总是和史家个人的才华、修养、见识甚至气质联系在一起的,越是高明精妙的方法,就越难以言状,也越难以传授。很多杰出的史家很少谈论方法,或许就是出于这个缘故。

当然,古今学者对史学方法并非完全没有讨论。史学方法读物为数不少,大体可以分成两类:一类侧重从理论上阐述方法,另一类则结合个人的治学实践来谈技巧和经验。第一类书籍大多出自史学理论和历史哲学的专家之手,以理论性和思辨性见长,有些还显得抽象而玄奥。例如,有一种苏联学者的方法论著作,把历史哲学、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糅合在一起,并对“方法论”和“方法学”做了区分。¹ 这类论著与治史的实际可能有一些距离,读过以后也许只对一些概念留有模糊的印象。职业史家一般不喜欢泛泛地讨论方法,而他们的回忆录和治学经验谈,往往能给人很多方法上的启示。他们涉及的通常是个人的经验体会,或许缺乏“理论深度”,但对实际的研究来说,其价值可能不会低于系统的理论。有的史家自称是“手艺人”,² 而杰出史家就成了“精通手艺的大师”(masters of our craft)。³ 手艺自然是学习的,初学者温习前人的治学经验,在老师的帮助下进

1 E. M. 茹科夫:《历史方法论大纲》(王瑾译),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。

2 美国历史学家格尔达·勒纳称历史学家为“技艺高超的男女手艺人”。见格尔达·勒纳:“历史学的必要性与职业历史学家”(Gerda Lerner, "The Necessity of History and the Professional Historian"),载《美国历史杂志》(*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*),第69卷,第1期(1982年6月),第20页。

3 亨利·阿比拉弗等编:《历史的视野》(Henry Abelove, et al., eds., *Visions of History*),纽约1983年版,第118页。

行研究的尝试,就是一个学习手艺的过程,这肯定比读方法论著作更有收获。

研究历史不仅要讲究修养和方法,还必须遵循一定的规范。古人所谓“绳墨”和“类例”,就含有规范的意思。章学诚说:“迁、固极著作之能,向、歆尽条别之理,史家所谓规矩方圆之至也。”¹他讲的“规矩方圆”,当然是古代的治史规范,与今天所说的学术规范并不完全一样。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,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一直在进行,学者的学术规范意识越来越浓厚,对于“学术腐败”问题也越来越敏感。这是中国学术正在走向“常规状态”的征象。学术规范相当于学术界的“法律法规”,但又不能借助立法程序来一蹴而就地制定,而需要在学术界的反复商讨和不断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完善,并只有通过学者的自觉遵守才能显出功效。学术规范建设当然不纯粹是学者的事情,还牵涉到观念、社会环境、学术制度等许多环节。

具体说来,学术规范是由学术通则和具体学科规范构成的;考虑治史的规范,需要恰当把握两者之间的关系,既要了解学术研究的共通原则,又要遵循史学所独有范式和技术性要求。需要特别说明的是,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讲究材料和根据,因而史学论著通常引文重叠,注释繁复,而这一点往往引起外人的讥诮和误解,似乎史家生有“掉书袋”的癖好,史学著述无异于资料汇编。有的职业史家对此也认识模糊,怀疑引文重叠和注释繁复的必要性,甚至将史学作品淡出大众阅读视野归咎于引文和注释过多。从学术规范的角度说,如果取消或限制引文和注释,史学的学科特性就无法维持。正是由于引文和注释繁多这一特点,史家才要格外讲究引文的处理和注释的体例。

总之,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出色的历史学家,这不仅是初学者关心的事情,也是每一个职业史家要用一生的努力来求索答案的问题。从研究者自身着眼,深厚的学养、纯熟的技艺和严谨的规范,无疑是取得卓著成就的必备条件。至于如何才能具备这三方面的条件,在中外史学史上都找不到一用就灵的秘诀,需要学者凭借自己的才华

1 章学诚:《章学诚遗书》,第552页。他提到的4个人分别是司马迁、班固、刘向和刘歆。

和苦功,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,逐渐摸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途径。有人说作家和哲人大多不是训练出来的,靠的主要是天赋和秉性;而历史学家则不仅要靠天赋和秉性,还须接受严格的训练,掌握专门的技艺。只不过,这种训练主要不是通过老师“教”来完成的,而必须依靠学生自己来“学”。¹ 初学者如果能孜孜不倦地读书,深入透彻地思考,刻苦勤奋地实践,就能逐渐步入治史的门径。

¹ 参见 G. R. 埃尔顿:《历史学的实践》(G. R. Elton, *The Practice of History*), 牛津 2002 年第 2 版,第 148--149 页。

第一章 历史学的特征

不论从事什么学科的研究,对这个学科的特性多少都要有一些了解。虽然研究文学的人很少争论“文学是什么”,物理学家也不必花费太多精力探讨“物理学是什么”,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本学科的定义漠不关心,只是没有掀起类似“史学是什么”这样热烈的讨论。历史哲学家和职业史家曾不惜笔墨地辩论史学的特性,似乎至今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。近年来,欧美史学界受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,这个话题再度成为一个讨论的热点。反复纠缠于这样一个“入门问题”,难免使学史的人感到费解和沮丧,但这也反映了史学的复杂性和特殊性。明了史学的特征以及它在现代知识体系中的位置,对初学者选择适当的研究路径,掌握基本的研究方法和规范,应当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准备。

一 专业化之路

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,在中国如此,在欧洲和世界其他一些地区也是这样。中国不仅历史悠久,还拥有源远流长的史学传统;¹ 在欧洲,只有史学、数学和天文学在成为制度性的学科以前,就已经独立存在了两千多年。² 但是,史学作为一个独立而专门的学科,却是相当年轻的,与众多后起的学科没有多大的差别。在知识体系和教育制度中,史学长期不是一个单独的学科,写历史的人大多是业余史

1 关于“史学”作为一个概念在中国史学史中的形成和演变,参见瞿林东在《中国史学史纲》(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,第7—12页)中的考论。

2 西奥多·哈默罗:《关于历史学和历史学家的思考》(Theodore Hamerow, *Reflections on History and Historians*),威斯康星州麦迪逊1987年版,第45页。